



中产阶级 的孩子们

60年代与
文化领导权

程 巍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

程 巍 著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This Academic Book
is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 / 程巍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6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2458-6

I. 中... II. 程... III. 政治-研究-西方国家-
1960~1969 IV. D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4702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6月北京第1版
200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6

字 数 398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册

定 价 28.00元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学术委员会：

季羨林
(主任)

李学勤

李慎之

苏国勋

厉以宁

陈 来

刘世德

赵一凡
(常务)

王 蒙

责任编辑：孙晓林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凡尔赛是针对巴黎而建的……用石头和水、大理石和镜子构筑一个象征王国，在那里，国王和他的扈从可以继续徜徉在那个未被城市生活的混乱所中断的时代，而宫廷音乐仍可以飘荡在蛙群的聒噪之上。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策略颇为奏效。巴黎和凡尔赛一直是两个互不搭界的世界。

——西蒙·莎玛《公民：法国大革命编年史》

目 录

引 言	政治激进主义的衰落	1
第 一 章	历史想象力	27
	力量感的幻觉	29
	历史主体	38
	父与子	55
	群体感：从“代”到“阶级”	87
第 二 章	文化领导权	119
	凡尔赛：一个象征王国	119
	分子入侵	126
	个案研究：英文系的制度史	148
	1. 纨绔子与浪漫派	149
	2. 阿诺德与古典语文学	170
	3. 第一批英国文学教授	198
	4. 利维斯集团	207
	5. 拘留所里的内奸	227
	6. 英帝国的鼯鼠们	237

第三章 政治意识的形成	250
站在空肥皂箱上的演说家	250
资产阶级的犯罪感	255
附录：犯罪感的消失	266
扶手椅里的革命家	276
三种运动：重合与偏离	287
从纠察线到街垒战	302
第四章 象征形式	328
语言恐怖主义	331
作为革命道具的身体	357
人群陶醉	360
延长的狂欢节	366
在法律的模糊地带	372
第五章 最后的革命	397
政治冷淡与无归属感	399
同心圆：制度模型	411
享乐主义的经济学阐释	444
运动的成本核算	450
重新命名	460
后 记	472
主要参考书目	474
索 引	484
出版后记	494

**The Children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Sixties and Cultural Hegemony**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Radicalism

Chapter I: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llusions of the Sense of Power

Historical Agents

Father and Son

The Sense of Being Together: from Peer
Group to Class

Chapter II: Cultural Hegemony

Versailles: A Symbolic Realm

“Molecular” Invasion

Case Study: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 The Dandies and the Romantics
2. Arnold and the Classic Philology
3. Early English Professors at Oxbridge
4. F. R. Leavis and Leavisites
5. A Spy in the House of Detention
6. Moles in the British Empire

Chapter III: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Blanqui on the Top of A Soap-Box

Guilty Sense of the Bourgeoisie

Appendix: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Guilty Sense

Armchair Revolutionaries

Three Simultaneous Movements: Coincidence and
Deviation

From Picket Lines to Barricades

Chapter IV: Symbolic Forms

Linguistic Terrorism

Human Body as A Revolutionary Prop

The Intoxicant Crowd

A Carnival Prolonged

Adventure into the Open Zone of Law

Chapter V: The Last Revolution

Political Indifference and the Lost Sense of
Belonging

Concentric Circles: Recasting the Institutional

Model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edonism
Cost Accounting of Social Movements
Re-naming

Afterword
Bibliography
Index

引言

政治激进主义的衰落

“我们的任务似乎始终是尽可能准备好选举。”让·皮埃尔·韦尔南在《68年5月》一文中谈到60年代以后西方左派的精神状态时说，“人们有一种印象，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68年5月的危机没有被解释，被分析，而是被抹却了。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言，历史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始终是那些不能预料的事：新事物、突变、转化、决裂、危机。”〔1〕

看似抹却了，其实还在那儿。它可能沉淀在无意识深处，并不时以笔误、口误、词语联想等方式显露出来；也可能暗中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其原貌已难辨认。精神病患者为了能正常生活，总极力排斥对早年心理创伤的记忆。1968年那代人如今似乎也是如此。“我变得越来越保守了。”不止一个人谦逊地这么说，言下之意，是变得越来越爱国了，所以“当别人称他们为‘保守主义者’时甚感愉快”。而在1950年却不然，有个背时的家伙竟“因以‘保守主义者’这类侮辱性语言称呼他人

〔1〕 让·皮埃尔·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70页。

而遭逮捕”。〔1〕当然，为了以示区别，当今的保守主义者往往在自己的称谓前添一“新”字，以为这么一来，就与1950年的保守主义（通常是麦卡锡主义）了无历史瓜葛了。

这些曾一度反叛自身阶级的前中产阶级大学生，在街头骚乱平息不久，就带着犯罪感和忏悔感，脱去嬉皮士（Hippie）行头，陆续回到中产阶级的羊圈，并在短短数年内迅速自修成了雅皮士（Yuppie、Yumpie），然后就以这个阶级的中坚的身份出现，令他们还沉浸在浪子回头喜悦中的父辈刮目相看。当权势阶层的成就感洋溢在他们脸上，当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出大人物的持重得体时，很难想象，这些现已不再年轻的绅士淑女也曾一度因革命而亢奋。他们已习惯于把那个狂热年代当作一段必须忘却的痛史。

另一种忘却方式更微妙，颇有精神分析之疗效，主要见之于后来成了教授或学者的前造反大学生身上。由于职业缘故，他们不能嫌碍事而把那段历史扔进忘川，于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强迫自己回忆它，分析它，为的是最终驯服它，甩开它。此乃一种忏悔式回忆，其妙处在于它同时是一种集体赦免仪式。它无意冒犯众怒，而是以堆砌细节的方式把60年代表述为一个事件，而不必冒险去寻求这场运动可能存在的历史理性。

毕竟，这是一个冠以“新保守主义”之名的时代，每个人都急于表明自己是秩序党人，正如当初每个人都急于表明自己是革命党人。“保守主义”在1950年还是一个贬义词，连真正的保守主义者都觉得难为情，如今却成了“秩序”的同义词，是屹立于后现代的文化和道德混乱之水上的一座坚固的石岛。在革命的时髦后，紧接着是保守的时髦。这种掺杂着当事人情感的道德批判，很难说是一种严肃的历史研究。历史就在那

〔1〕 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v.

儿，不因人们的忘却而消失，也不因人们的忏悔而稍有所动。它有自己专横的意志。此外，那段历史至今仍没完结，依然是活的记忆，因为那代人并没有随那个时代死去。他们在经历那场人类学意义上的蜕变后，依然活着，大部分还活得挺好，并已进入社会学所说的“权势年龄”，即执掌社会核心权力的年龄层，大约在55到65岁之间。在当代生活各个权力场中，都能看见他们庄重的身影。少数人成了政治家、策略家或外交家，周旋于国际和国内风云场；另一些则成了一身体闲装打扮的教授或学者，在大学讲台或报纸专栏上神情冷淡而又非常专业地讲解着马克思、福柯和德里达；更多的成了大公司总裁、跨国公司主管、证券交易商、房地产开发商等，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如鱼得水——总之，是成了他们当初嗤之以鼻并加以反叛的那个阶级的权势人物。

但正如任何过往时代总会有零星几个不思改悔的孑遗一样，也有那么几个一直怀揣60年代梦想的革命遗老。其中一些不那么走运，被失败的记忆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弄得日渐颓废，竟至“发了疯，或丢了性命，另一些则散落在满是火药味的激进小团体或残余的群居生活小圈子里”。〔1〕当这些小团体、小圈子在70年代纷纷自行解体后，他们就失去了最后的群体依托。人们也不再从政治上严肃对待他们，视为避之惟恐不及的难缠的老家伙。民主社会既容得下黄色影片，自然容得下几个性格乖戾的革命遗老，作为它自身的合法性证明。他们仍穿着60年代风格的服装，四处寻找必须立刻予以纠正的错事；或不时搞出一些花哨的噱头，全不顾上了年纪。

我就认识这么一位，是60年代波士顿大学的学生，五十多岁，穿一件邋里邋遢的套头衫，下面是一条满是油渍的牛仔

〔1〕 Morris Dickstein, *Gates of Ede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Six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76.

裤。我至今没弄清他主要靠什么为生，只知道他总活动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的中央广场一带，在那儿一家日渐衰败的旧书店当半职伙计。墙皮剥落的店门上方挂着本店的招牌——“激进书店”，与中央广场一带的商业气氛颇不协调。

“我叫詹姆士。”他总是对初来乍到的顾客这么介绍自己，一旦发现你对激进主义感兴趣，他就眼睛发亮，自告奋勇领你去看顶部插有“Radicalism”分类卡片的几个书架，并从后面的库房搬出大摞大摞他认为必看的激进书籍，眉飞色舞地一本本介绍过来，仿佛你不是来买书的，而是来和他讨论问题的。每隔一两周时间，他准会通知你，在某条街道的某个旧书店，将有一场小型讨论会，谁谁将参加。他兜里似乎揣着整个大波士顿地区所有激进派人士的花名册和电话号码。年轻的店伙计说他“热衷于政治”（very political），但我总怀疑，他的那种政治正日趋变为“地下政治”，恰如他参加的那些讨论会通常是在地下室举行（大部分旧书店都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因为那里租金便宜），而街道上面，在阳光下，是熙熙攘攘而又忙忙碌碌的市民，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后来，中央广场进行市政改造，强制拆迁的告示贴在“激进书店”的玻璃橱窗上。于是，这位老激进派联合当地一些不愿拆迁的居民，在中央广场发起了一场不成功的小规模抗议活动。数月后，“激进书店”的招牌出现在一条远离大学区的偏僻街道的一座二层小楼的入口处，一段狭窄而陡立的楼梯通向二层的书店，但物是人非，从前的店员和读者都星散了。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激进时代的激进书籍在脱离他们旧日主人的书房后，都纷纷流落到了旧书店，而那个时代的革命遗老的身影也全都像幽灵一样飘荡在那里，与那些不可能再版的旧书呆在一起，梦想着一个已然消失的过去和一个不会到来的未来。距哈佛广场不远，在马萨诸塞大街上，也有一家旧书店（店名“红色书店”），店小书少，门可罗雀，可有限的

墙壁上却并排挂着马、恩、列、毛的巨幅画像。店主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攀谈中她得知我来自中国，便认定我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在气质、生活方式和语言上仍徜徉在60年代，使我蓦然想起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他们比我好，因为我比他们复杂。”

1998年6月的一天，我走进“激进书店”，看见几个年轻店伙计围着詹姆士，手端香槟，正向他表示祝贺，他则像归来的英雄，手舞足蹈地描绘着那个戏剧性场面——原来，一小时前，当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哈佛演讲时，他突然从听众席后面站起，大声打断她，让全场有教养的绅士淑女大吃一惊。伙计们向他的这个举动表示祝贺，至于他到底向国务卿提了什么问题，她又如何作答，他们则不感兴趣。我想他本人也不会太感兴趣。重要的是打断她的演讲，让这个大权在握的铁娘子感到尴尬——这就够了，算得上一次成功的奇袭，是60年代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一种战术。他会寻求在一切场合打断大人物的演讲，不管他到底在讲什么。

这些革命遗老大概奉行福楼拜那句极不谨慎的政治宣言：“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即便如此，在一个流行政治冷淡症的时代，他们仍落寞得很。这种普遍的政治冷淡，使人想到C. 怀特·米尔斯《白领》中对新中产阶级的描绘，倒好像此书不是写于1951年，而是1980、1990或2000年，它在这些年头可以找到远比1951年更丰富的佐证。

如今，唉，正如60年代那首非常流行的反战歌曲所唱的那样，“所有那些花儿都飘到了何处”？1982年，欧文·豪在回忆录《希望的边际》中，谈到60年代新左派运动几位主要领导人后来的去向，口气颇不屑，大有老资格左派奚落半途出家却又很快折身回去的冒牌左派的味道：汤姆·海顿加入了民主党，尽管以前一直瞧不起它，并讥讽哈林顿和欧文·豪一干老左派居然天真到相信激进主义可以通过民主党发挥作用，如今

却认为民主党才是激进主义惟一有所作为的地方；热尼·戴维斯成了某个通灵会的会员，开始相信自己拥有与亡灵沟通的本事；杰里·拉宾去了华尔街，做起了发财梦，而且一路青云；托德·吉特林留在大学，忙着写忏悔录一类的东西；“其他人则不知所终了”。〔1〕都没有“飘落到各处的坟地里”。

那一代人的消失，带走了一个热情而富于正义感的时代。当今时代有充分理由对政治狂热保持冷淡，而稳健的常识也忠告人们：宁可生活在平庸的时代。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却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冻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庸智慧。人们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情，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革命，在后革命时代人看来，是一项高成本风险投资，高得足以打消任何革命念头。要对付以政治高热为症状的法国病，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患上以政治冷静为症状的英国病；萨特之后，必定是雷蒙·阿隆；凯恩斯之后，必定是哈耶克。屋顶上的风信鸡已转向了右边，全世界的保守主义者都忙着在英国的新老自由主义仓库里搜寻派得上用场的货色。

于是，那些仍怀揣着乌托邦梦想可脾气却越发乖戾的革命遗老，显得尤为形单影只。他们构不成一个群体，也就不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存在。由于本书是对运动的研究，即对群体的研究，因此只把激进时代的孑遗当作例外，是从一个变化的庞大群体上遗落下的碎屑，不予考察。但那个群体仍是清晰的，是曾经躲在街垒后面大骂休伯特·汉弗莱是“猪猡”而如今端坐在演讲厅听奥尔布莱特演讲的那群人。它不再以社会运动的形式而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存在，而且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口齿伶俐

〔1〕 Irving Howe, *A Margin of Hope: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83, p.325.